

# 金银藏史

对于生活在川西的人来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是说不尽的话题。关于江口沉银的版本，更是有着神奇的故事。“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个巴蜀地区流传300年的民谣，让张献忠的宝藏变得扑朔迷离。2016年4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张献忠沉银地点彭山的江口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截至2023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共出水文物7.6万余件/套，开创了四川考古新纪录。“江口沉银”随后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口沉银博物馆坐落于岷江与府河交汇的三角洲上，紧邻沉银遗址。博物馆共占地60亩，有三个常规展厅和一个临展厅。现在的展览包括一展厅“水落银出”、二展厅“沉银解谜”、三展厅“白银故事”，以及临展“明清外销瓷”，有机地呈现出了江口沉银的内容。

博物馆于今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自开放以来就吸引着众多游客打卡，探索大西政权的奥秘。

江口沉银博物馆是以金器收藏为主的博物馆，其建筑本参考古代钱币，采取外圆内方的设计，体现出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的建筑风格。

走进博物馆，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感受到的是晚明时期的蜀地风物史，更是张献忠的人生缩影。

## 绝世「金印」制作技艺十分高超

走进博物馆，看到琳琅满目的藏品，就知道张献忠当年仓皇出逃时，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社会现实，得到的许多珍宝一时无法带走，只好采用沉入水中的方式保存下来，以图东山再起时再来取用。

在成都的望江楼公园，民国年间就有淘金公司进行挖掘，期望寻回张献忠遗留的这批宝藏，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彭山的江口镇，却发现了更多宝藏的蛛丝马迹，最终发掘出大量的文物。而最让人惊奇的则是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印”，作为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博物馆，观者这枚“金印”后，人们不得不叹服，明代的金器制作已然有着十分高超的技艺。

这枚“金印”总重3195克，印面阳文九叠篆“永昌大元帅印”，背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虎钮踞伏。

1643年张献忠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正准备入川建立大西政权，彼时就为了仿制明代武将的金印而制作这枚颇具时代特色的金印。这是大西政权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确认江口沉银遗址身份的核心证据。

这枚金印的再现，让我们对张献忠的人生多了些认知。他极力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西政权在世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然而，历史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的。金印见证历史的时刻，亮丽而又短暂。

## 「大西金册」窥见明朝册封制度

在“江口沉银”未大面积挖掘之前，大西政权留下的文物不多，因此讲述这段历史时多有语焉不详之处，至于民间文学的解读，就更加丰富。但在江口遗址出水了大西政权金册之后，人们对此段历史有了新认识。

这些金册是大西政权册封妃嫔、官员时使用的，填补了典章制度空白。

张献忠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农民军政权，1646年死于西充凤凰山，大西政权覆灭。那么，这个短暂的政权是如何运作的？从留下的金册可以看出些端倪。

大西政权采用的依旧是明朝的册封制，但又与明制有所差异。专家研究后认为，“大西金册”形制直接继承自明朝，但其材质、尺寸及内容均与明代册封妃嫔册有一定差别。史料记载，张献忠有九位妃嫔，但从这些金册体现的数量看远超此数，而对妃嫔的册封，不仅是对身份的确认，也是大西政权的重要管理制度之一。

博物馆展出的女性金册饰品数量也很可观，制作精美。这些金册饰品有可能是妃嫔留下的，也有可能是抢掠而来的。不管怎样，这都让人看到它们的过往，是等待人们解读的秘密。

这些金册集中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大西政权撤离成都时，可能将这些金册收存起来以充军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的匆忙与慌乱。

## 「蜀世子宝」金印 全国仅此一枚

在这座充满金银风格的博物馆里，还展出了另一件独特的文物——“蜀世子宝”金印。此金印为方形印台、龟钮，印面铸九叠篆阳文“蜀世子宝”四字。这个金印现为国内唯一明代世子金宝，重约16斤；出水时碎成5块，耗时半个月才找齐。史学专家们认为，江口沉银的背景是张献忠与南明将领杨展在江口的一场惨烈战斗。

1646年，大西政权可谓“内外交困”：清军肃亲王豪格入川，南明将领杨展据嘉定府（今乐山）渐成气候，当时成都粮荒严重，张献忠听闻杨展兵势强盛，心生惧怕，决定率大军携财宝顺岷江南下，意图先与杨展决战，占据嘉定或转战湖广。

然而，江口却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在这场战斗中，张献忠失利，抢来的金珠宝物就此留下，留下了时代的印痕，并给人们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新依据。

“蜀世子宝”金印在挖掘时虽然已成为碎片，还是被专家们拼接在了一起，还原了文物的面貌。明代蜀藩王自朱椿开始，使用的就是这枚“金印”，传承至末代蜀王，历经254年、14位蜀王。

由此代代相传的金印，可看出明代蜀地藩王传承有序。

此外，江口沉银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张献忠从明代藩王府掠得

## 巨量金银锭 锁定张献忠活动范围

在博物馆参观时，游客都会留意到展出的金银锭数量众多，看上去很有阵势。它们均为五十两金锭、银锭，但来源不一，品质也略有差异，典型如“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明代藩王岁供金）、大西政权自铸“大顺元年眉州大根银五十两银锭”。从这些金银锭铭文的记载来看，共涉及明代二十余府州县及税种、银匠名，证实金银锭来源是明代各地官官府库。

同时，从这些金银锭的信息，可以看出大西政权的活动范围包括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大西军队每到一处首先是劫掠官府的库房，这也暴露出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的本质并不是来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转战各地，抢掠金银财宝，搜刮民脂民膏，以此丰富军资，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奔走，

# 云霞缥缈 窑变生辉

宋代禹州钧窑，知其存世量极少。禹州钧窑起于唐，盛于宋金。宋代钧窑所创的铜红窑因受宫廷的偏爱，被垄断为官窑，专烧各式花盆、罐、尊、瓶、炉等陈设品，以浑厚华美的窑变釉色取胜。

宋代钧窑釉色独特，它不同于由玻璃相组成的透明青釉，是一种典型的二液相分相釉形成的乳光青釉。绝大部分产品的釉色是各种浓淡不一的天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更淡于天青的称为月白，几种釉色都具有如荧光般的蓝色光泽，极为美观。蓝色乳光釉是钧釉的重要特色，但钧窑的紫红色釉特点更为突出。红色是釉料中铜的还原色，紫色是红釉与蓝釉相互融合的结果。天蓝

釉上的紫红斑，是于天蓝色釉上随意涂洒铜红釉所致。钧釉的另一特点是釉面上显现出“蚯蚓走泥”纹，是由于在素烧胎体上施厚釉，釉层在干燥或初烧时出现干裂，后被高温阶段的低粘度釉流入填补裂缝而造成的纹理。

宋代钧釉在天蓝色中闪烁着红或紫的斑块，这是钧窑铜红窑变釉最鲜明的特征。在高温的窑中相互熔融而产生出窑变釉色，如茄皮紫、丁香紫、玫瑰紫、胭脂红、朱砂红、海棠红、火焰红等。宋代钧窑的铜红“窑变”历来为世人所珍，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之说。这件宋代钧窑双系六棱罐就是“窑变之美”的绝佳载体。

古陶瓷在宋以前多以青

釉做装饰，钧红的烧制成功开创了一个新境界，特别是为元明清各时期高温颜色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谱写出陶瓷史上的新篇章。钧窑的铜红窑变釉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中透青、青中透红、青蓝错杂、红紫相映，宛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的一片彩霞，五彩渗化，交相辉映。古人曾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用来形容钧窑窑变之美妙、釉色之艳丽。

铜红窑变釉的成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正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经过窑变，使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为其他窑口所不及。（据《联谊报》）

## “止戈为武”话玉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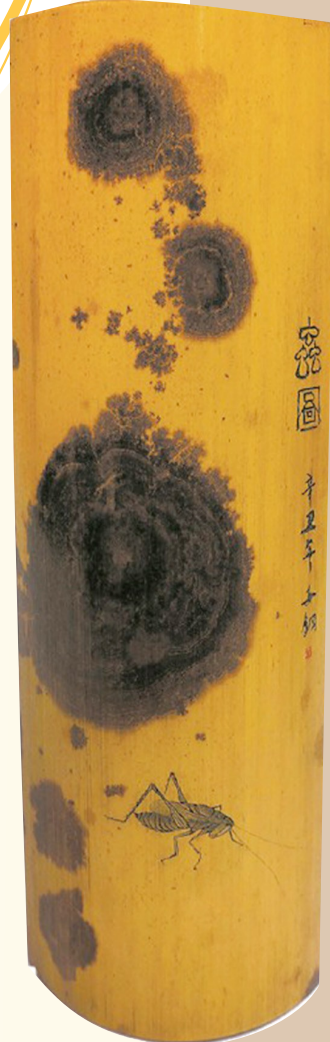
楚王墓玉戈

这件楚王墓玉戈，现藏于徐州博物馆，宽17.2厘米，高11.2厘米，短援、长胡，胡刃上有一棘刺，刃厚0.35厘米。侧刃三穿，方形内，内上有一横三角形穿孔，孔长0.9厘米。援及胡部主体饰以浅浮雕的勾连云纹。援上、下刃部内侧有阴刻双线条边，框内阴刻小S形纹。内部用阴线细刻成四个大的S形纹。援、胡之下透雕有一只异常凶猛的虺虎，虺虎头上尾下，略成S形，虎口大张，利齿外露，尖耳圆腮，细长腰，背有毛羽三缕，丰臀，尾上卷，作奔走状。玉戈主体两面纹样相同，戈内上角作一弧缺，而十分突出的则是戈内两面纹样的差异：一面浅浮雕虺虎，虎昂首张口长啸，利齿尖耳，肢体随戈内穿孔形状作“U”字形卷曲回环；另一面则浅浮雕朱雀纹饰，朱雀直颈昂首，有后斜的羽冠，突圆睛，钩喙开张，长尾披垂，双爪上扬。整件玉戈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动物形象生动传神，堪称西汉玉雕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

玉戈是一种特殊质地的戈，结合了美玉高贵、润泽的秉性和武器威严、杀伐的气息，显而易见，它不是一种实用性的兵器，而具有非比寻常的尊崇。它作为非实用性武器和专用礼器的出现，标志着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时代的肇始。

戈从生产工具发展成战争工具，直至成为祭祀工具和礼仪工具，其材质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很难说明青铜戈和玉戈出现的先后次序，但可以明确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了玉戈。玉戈是用玉做成的戈，其基本组成部分是有刃的“援”和嵌入木柄的“内”，内又有直内和曲内之分。后来，从提高实用性、增加杀伤力的实战意义出发，青铜戈在“援”和“内”相接处出现了上下的突出物——“阑”，援的下部也逐渐延伸出来，称为“胡”。玉戈作为一种礼仪用器，其发展演变主要基于彰显威仪性的考虑，并没有全盘接受以实战为要务的青铜戈演化轨迹的影响。“止戈为武”，已经是个常识，即汉字的“武”字拆开就是一个“止”和一个“戈”字，而且是一个带阑的戈。止戈，内含制止战争的意义。汉字“武”，却带有和平的意思，不能不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善良。这种用武力保卫和平的精神，蕴含着辩证法理念和深沉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据《联谊报》）

## 草虫幽趣·竹刻臂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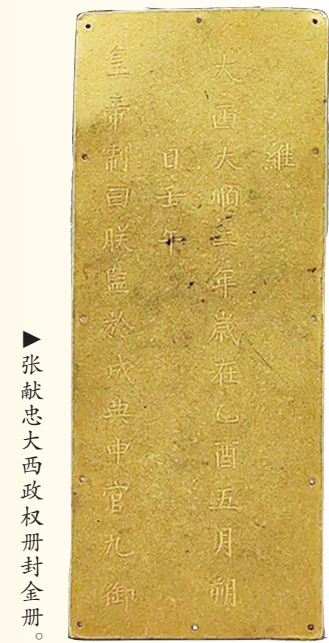
这件以草虫幽趣为题的竹刻臂搁长24.5厘米、宽8厘米，由上海工艺美术大师罗安钢创作。作品凭借独创手法，将传统文人“格物致知”的审美意境与竹刻工艺完美结合，尽显“小器载大艺”的东方微视觉。

“草虫幽趣”锚定自然微观世界，画面中小虫姿态鲜活：触须纤细若游丝，肢体劲健似蓄势，搭配竹材天然的湘妃斑摹写草木、石苔，暗合“一虫窥天地，寸竹藏春秋”的文人雅趣。竹材的清雅质感与草虫的灵动姿态相互交融，传递出中国人对“微小生命之美”的敬畏与珍视。

绘刻相融是此作的匠心所在，作者以刀代笔，将笔墨意趣化为刀痕韵律。虫身采用细刀密刻，凸显甲壳质感；触须运用单刀游丝刻，尽显轻盈灵动；腿部以凹地刻打造立体层次。竹面天然肌理搭配留青刻、浅刻技法化作草木苔痕，二者浑然一体。题款采用阴刻填墨，字体古拙质朴，与整体风格相得益彰。

作者巧借竹材本身特质，让实用形制与艺术构图融为一体。臂搁弧形竹面顺着画面纵向走势延展，草虫在下、斑纹在上，宛若小虫沿竹坡缓步爬行。竹身原生竖纹，与雕刻线条交错呼应，让平面画意立于立体竹材之上，竹之天趣与画中文思交融共生。

臂搁造型简约修长，画面布局疏密得宜：小虫盘踞下方，细节精美；斑纹铺陈上部，疏朗有致；留白处如宣纸透气，任气韵自然流动。视觉焦点落于小虫，却因竹纹的天然韵律不显局促。整体风格“简而不空，精而不繁”：小虫的灵动、斑纹的古雅、竹材的温润，在暖黄底色上和谐共生，尽显中式美学的微视觉。（据《新民晚报》）



张献忠大西政权册封金册



宋代钧窑双系六棱罐